

当代乡土小说研究之审美意识的建构

——评贺仲明《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

□钟世华

乡土小说伴随现代文学的发生而出现,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结出许多硕果,如何选择恰当的视野与方法成为今天乡土小说研究的着力之处。当然,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并不在于其新奇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能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精神的共振与思想的融通。在此意义上,贺仲明的新著《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正通过建立审美研究的特殊视角,将目光探触到70多年来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之中,细致地考辨了乡土小说的审美姿态、艺术形式以及作家审美心理等问题,也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建立起深刻的联系。在贺仲明看来,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研究绝非文体形式、叙述视角、结构层次等方面的简单观察,而是深入探究由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生活与文化政策等综合性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并据此建构出当代乡土小说研究的审美意识,既为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方法论的指引,也为当前的乡村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基于当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整体观”,是该书在建构审美意识过程中坚持的核心理念。相较于一般的文学思想、作家地位、作品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来说,审美研究更加具有整体的观念,其本身包含“美的形态”“美的观念”与“艺术表现”等内容,能够在文学本体和社会文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建立统一的关系,呈现研究视野与方法的综合性。该书在探讨乡土小说时虽然把当代70多年分为“1949-1976”“1978-1999”“2000-2015”三个时期,赋以“革命时代”“改革时代”“新世纪”的命名,但在具体论述时并非采用独立的、割裂的视域,而是深入挖掘与呈现了不同时期乡土小说之间的隐秘关联,同时也结合了现代时期的乡土创作状况,形成审美研究层面的整体观。早在

19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就提出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引发学界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认识变革,但此种方法在随后的研究中其实运用得并不理想,许多学者依旧采用断裂的、孤立的意识来对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此而言,《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是对“整体观”的积极回应,同时也与当前研究中的“南方文学”“南方写作”等热点现象产生对话,在研究实践上具有示范的作用。

具体来说,该书在探究“革命时代”的乡土小说时自觉地运用了整体性的视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表现出崭新的思考。贺仲明以孙犁、赵树理、浩然、柳青等“革命时代”的乡土小说家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乡土化抒情、农民文学目光、作家审美心态等问题,使这些作家与现代时期废名、沈从文等经典作家以及解放区文学创作之间建立起深刻的关联。这便重新激活了1950-1970年代小说研究。而在“改革时代”以及“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探讨中,贺仲明也注意到其与“革命时代”的社会心理与审美文化之间的关联,这尤其体现在那些成长于“革命时代”的先锋小说家身上,虽然他们在新时期之后借鉴的创作资源更加丰富与多元,但在结合中国本土化语境的过程中,“革命时代”乡土小说中的写实主义依然得到持续的运用。

尽管该书立足于研究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历程,但作者还是以精准的目光捕捉到了其中存在的“不变”因素,诸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人”的观察等。这里的“不变”并非与“变迁研究”的主题相互矛盾,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强调

了乡土小说的文体要素,而这些要素是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同时意味着,任何研究都不能为了追求视角的新颖而剥离研究对象的本体,一旦忽视本体性的要素,任何创新性的方法都不过是虚假的炫技。在谈到现实主义的方法时,贺仲明认为其在“革命时代”的乡土小说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通过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创作实践,深刻影响了此时期乡土小说的精神历程与传播接受。到了“改革时代”,多元思想潮流的传入拓展了乡土小说家的创作视野,也使其对于乡土内核的思考更加深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家们完全丢弃了现实主义,而是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式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既有力地吸收西方创作潮流,又与中国本土语境紧密结合的创作方式,更加契合社会时代发展变迁的需求。即便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依然是红柯、李进祥、石舒清、贺享雍,乃至更年轻的“80后”作家马金莲、甫跃辉、郑小驴等人在创作中坚守的本体要素,抑或是精神层面的自觉追求,只不过在地域性、文化性、社会性的作品中表现出形式的差异。

对“人”的观察成为该书着力塑造的又一“不变”因素。贺仲明指出,无论是现代时期还是当代时期,乡土小说创作中的“人”均作为主体性要素得到集中再现。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小说而言,乡土小说更加关注乡村转型过程中“人”的现实遭遇、生存处境、心理变化等问题。正如该书结语部分所指出的,“作为乡村生活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所发生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既渗透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也涉及深层的精神和文化世界”。所以,“人”的问题不仅是以往乡土小说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直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6月
《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贺仲明

接关系到乡土小说在未来的发展进步。

乡土小说的变迁绝非简单的文学形式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是涉及到总体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结构的转变,我们透过乡土小说这一载体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这也是《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一书着力强调的思想维度。无论是该书提出的“将美的内容、方式融入乡土文化建设之中,让文学、审美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一美好夙愿,还是在分析贺享雍《乡村志》时表现出的为乡村决策者和关注者提供启迪的思想,抑或是面对信息化时代,发出的恰当引导和调整社会文化管理的呼吁,其中均蕴藏着通过文学研究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宏大愿望。未来的乡土小说若想“以其独特思想和艺术性格,以及独特的魅力价值,卓立于小说世界中”,其本身就不能仅仅回答文学层面的发展变化,更应当在乡村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维度上进行持续的探索,积极回应社会发展变迁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寻求更加有效的解决方式。

(作者系南阳师范大学研究员,文学博士)

生生不息的东方红精神

□赵克红

是,彰显着中国工业气质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耐火材料厂、洛阳四〇七厂一字排开,在洛阳涧西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形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线。随即,一批批祖国的优秀儿女,从四面八方迅速向洛阳集结,他们为了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奔赴洛阳,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和建设中。为奠基、为建厂,多少人流下了勤劳的汗水,涌现了许多英雄劳模,终于使六大厂矿巍然矗立在了涧西的土地上。

这是新中国工业的伟大创举,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精神和东方红精神的有力展示。走马上任的干部们,用曾经握枪的手,翻图纸、开机床。面对困难,创建者们发扬“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从加工出第一颗螺丝钉到建厂房、造机床,从没有图纸到组装出一台拖拉机。研发过程中,一拖人用聪明才智、汗水和心血,历经曲折与磨难,攻克一个技术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比预期提前生产出了第一台名为“东方红”的拖拉机,一拖人创造出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神话。

在近70年的岁月里,一拖的东方红精神不断传承出新。一拖持续不断研制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开拓新市场,加快打造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农机企业,真正扛起“农机长子”的责任,让“东方红”这一民族品牌熠熠生辉。这正

是东方红精神的延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但凡一个国家要建设现代化文明,就必须有工业文明的先进行。18世纪的英国是如此,20世纪的美国亦是如此。东方的大国,在打破一个旧世界新站立起来后才发现,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文明这堂课必须要补上才行。于是,包括中国一拖在内的156个工业建设项目如棋子般落户神州大地。世界工业重心的迁移和东方大国的崛起,这时隐隐有了朦胧的轮廓线。

《东方铁牛》寄托了一拖人和关注一拖人的深厚历史情结。作者李芸霞是一拖退休职工,下过车间,做过后勤,她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将我们带到了那个战天斗地的火红年代,让我们领略了20世纪50年代初洛阳涧西火热的建设场面,和几十年来洛阳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再次目睹了农机长子的风采。如今那些为数不多的、仍然健在的第一代一拖老人,谈起往事,总是热泪盈眶,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离开了故土,把家永远安在了洛阳,他们当中甚至祖孙三代共同助力一拖,把中国的农机事业的发展繁荣,当成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使命。

《东方铁牛》一书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口述历史,以广阔的视角还原了那段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还原了东方红拖拉机诞生的艰难过程,展现了上百名真实人物。其中既有杨立功、马捷、郑定立等一批第一代创业的优秀领

导者,也有奋战在各个岗位的最前线的工人。尤为珍贵的是,作者还采访了20多位第一代创业者和他们的亲属,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为生动画卷第一代一拖人在那个艰苦岁月所展现出的东方红精神增添了无限光彩。《东方铁牛》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对健在的第一代创业者的最高致敬,也是对已故第一代创业者的告慰、缅怀,更为后代子孙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

一个作家不仅要有才华、有情怀,更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近年来,能震撼人心的工业题材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是作家不能深入开采和探究所书写的领域。实际上,当今中国的巨变,为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令人欣慰和感慨的是,李芸霞具有顽强的毅力和笔耕不辍的精神。她先是搜集史料,又从浩瀚的史料中披沙拣金,历时两年,通过扎实的采访和充满激情的写作,终于将这组现实主义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这部书中,我看到了作者的担当与追求,看到了东方红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看到了一拖作为国之重器行稳致远的精神密码,看到了洛阳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既有时代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既饱含深情又文笔优美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本书的出版,对传承先辈基因,赓续东方红精神红色血脉;对挖掘工业创新创造精神,开拓新质生产力,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工业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也是对工人阶级、对劳动者奉献出的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作者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

意象“蜂群”与语言献礼

——评王太贵新诗集《青瓦之上》

□杨不寒

们能够超越自我局限,更全面地观看到自己的处境和世界的真相,从而达到某种启蒙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便迈向一条抵达真与善的道路。

整体上来看,诗集《青瓦之上》很接近生活诗学的范畴,在题材、视境、意象等方面往往与现实生活存在血肉关联。王太贵在诗中作纯粹的玄想,而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创造诗。除屡屡被书写的“礼堂路”之外,现代纪行诗《Z226》可以看作另一个生活诗学的例子。在该诗中,诗人用极经济的笔法,写下了抒情主体在“Z226”火车上的片段见闻。“我”、“吃语”的“孩子”、“对镜施粉的女人”和“酣睡”的“异乡人”等人物与窗外飞逝而过的“塑料棚”“沟渠”“白杨”等风景相呼应,逼仄的车厢与窗外广阔的天地相对举,旅途的劳累和观看女人化妆的悠闲相缠绕,鸡飞蛋打的“生活况味”与遐思中的“梅花鹿”相对照,梦境与现实相渗透……种种张力关系,交织成既辩证又统一的审美空间,构成了极富真实感和颗粒感的生活诗学。从中我们还可以阐发出诗人对越来越简化、私密化和思维茧房化的现代文明的

不满,诗人不断提醒我们尽可能地去观看周围世界,毕竟我们自己正是处于与周围事物的各种关系之中——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是更广泛的人与对象世界间的关系。

就像《Z226》一样,在王太贵的诗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纷繁驳杂的生活图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图景全部是由语言的“不定点”来显现的。他以“礼堂路”为诗学根据地而创作的诸多诗篇,亦可以看作语言的献礼。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王太贵是在语言世界里建构出了繁复而精细的生活镜像,映照着现实世界,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在此,我们不妨对他的创作风格做一个整体上的描述:他擅于以词象带动丰富的物象,进而组建譬喻般的意象,意象的排列或叠加最终构成了他包罗万象的诗歌世界。那些纷至沓来的词语和联想,颇有陆机《文赋》中所谓“瞻万物而思纷”“挫万物于笔端”的味道。从肌理布置来看,他的诗则让人想起元代王蒙的山水画,元气淋漓,纵横铺陈,很多时候甚至稠密得分不开笔。

诗人并不在具体的事物上做过多涂抹,只

留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暗示。于是,我们得以在王太贵的诗中,重新看见汉语诗歌最古老却又最新诗学的一种原则,也即赋的原则:“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一如前文所言,王太贵名词繁密之诗总是在提醒我们是处于复杂的物我关系之中,在他的赋一般的铺陈之下,可以看见抒情主体如何调整与确定自我的存在,而这完全可以视作他“体物写志”的方法论。总之,王太贵“蜂群”般的语言风格,当是自觉探索的结果。终于,如诗集《青瓦之上》前半部分所展现的那样,在横向思维的转喻链条上,“蜜蜂”般的语言来了,并且来得成群结队。

最后,我们不妨说,在诗歌世界里存在两个王太贵,一个能够熟练地创制某种文体诗,在各项诗歌大赛中拔头筹,另一个则像我们在诗集《青瓦之上》中看到的这样,专注于诗艺、物我关系以及存在之谜的沉思与探索。虽然转喻式的诗歌语言仍然为两者所共享,但是,后者的思绪主要发源自幽微的心灵深处,诗人创造的密集意象,也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关系中确认抒情主体的存在,这自然与征文体诗歌依附外物、指向外物的诗意生成逻辑相异。我们清楚地看见,在诗集《青瓦之上》中,这位“礼堂路”上的诗人正在用语言,实现着他故乡乃至整个尘世的献礼。这句话反过来讲,想必也是恰当的,那便是诗人认真体悟着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思绪,以“蜂群”般纷繁而迅捷的意象,展开着他现代诗歌语言的献礼。

(作者系诗人、诗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急速变化、充满不确定的年代,人类的“亲密关系”也莫能例外。文学关于“亲密关系”的书写,从古典时代、神圣时代、世俗时代进入到现代、后现代时代,尤其是在缤纷复杂的当下,“亲密关系”的神话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自我解构。自我解构的途中,又试图重新建构其神圣性的精神向度。黄丹丹的短篇小说《南有嘉鱼》就是当下“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审美建构。

首先,《南有嘉鱼》的小说命名不落俗套,别具意味。读者阅读伊始,想到的可能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然而,随着小说叙述的展开,古典诗词里的“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中呈现的乐陶陶、乐悠悠、乐平安、劝满觞的温馨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被拧巴、别扭甚至别扭的家庭气氛所代替。小说以郑家瑜和郑家亮一对双胞胎姐妹的人生故事所展开,她们之间的关系从别扭、紧张、猜忌到最终消除误解,重归于姐妹温情的过程。从叙述基调上看,小说并不是反讽的叙述,而是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正面建构。小说的结尾“我和小瑜像两个逃学的小孩似的,撒开脚丫奔跑在春夜的新城大道上。”文本叙述曲终奏雅,实现了“南有嘉鱼”“鼓瑟吹笙”亲密关系的书写意图。作家在一个神圣性零落成泥的时代,建构亲密关系的正当性、神圣性。小说借文本亲密关系的叙述,发出了深切的生命追问与重新回归亲密关系的价值姿态。

其次,小说对亲密关系的审美书写意蕴丰赡,主要体现在双胞胎姐妹关系(郑家瑜与郑家亮)、爷爷和双胞胎姐妹的祖孙关系、父母与双胞胎姐妹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我”和儿子翩翩的母子关系,“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关系以及婆媳关系等等。小说中的亲密关系主要体现在血缘伦理的亲情关系以及夫妻两性、婆媳的非血缘关系伦理及其现实情状的复杂纠葛中。“既生瑜何生亮”是小说的开篇,揭示了郑家瑜和郑家亮这对双胞胎在成长过程中复杂紧张对峙的姐妹关系。她们从生下来就被人为地分开,之后不同的成长环境与命运轨迹造成了她们关系的隔膜与裂隙。姊妹情深的血缘伦理被现实的境遇不断消解,与传统的伦理温情相去甚远。爷爷对“我”的平淡与对郑家瑜的在乎和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仅是因为“我”跟着父母长大,而郑家瑜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为何要将双胞胎姐妹分开养育?是什么导致了亲姐妹关系的变异?随着叙述的渐次深入,伴随着姐妹关系主线的其他血缘关系也逐渐显露出真实的面目。爷爷对双胞胎姐妹表面上的厚此薄彼,郑家瑜和爷爷奶奶的特殊感情,郑家瑜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乖异,“我”和姐姐郑家瑜的貌不合神亦离,以及“我”和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我”和父母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都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里得到了擘肌分理的摹写。亲密关系的血缘、亲情及其伦理的纠缠、变异都其来有自。这里不仅仅有时代思想语境的成因,更有亲情伦理内部的情感逻辑。通过亲情伦理关系的真实书写,小说揭示了家庭伦理内部“匮乏”“缺席”的爱,需要更真切的爱、救赎、理解与沟通。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小说也揭示了夫妻两性之间的婚恋以及婆媳等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及其伦理。这一切都是亲密关系中非血缘伦理的另一面,它们聚焦的是情爱伦理、家庭伦理的日常或裂变。它们都经历了沟通不畅、相互怨恨、情感疏离到相互理解、彼此懂得的过程。在这一叙述呈现过程中,多维关系的真切描述,见出了作家的叙述功力与对生活的深度认知,同时也见出了作家对理想亲密关系重塑的叙述伦理——期待用文学的方式建构起融洽、和谐的亲密关系。

再次,《南有嘉鱼》体现了较好的艺术成度。黄丹丹写散文、写诗歌,在语言的锤炼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好的小说必然需要好的语言。这篇小说的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清明。无论是叙述语言,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都很简洁清晰、不枝不蔓、明快畅然,这也比较符合当下轻逸化的审美书写潮流。小说的叙事节奏也比较轻快,小说尽管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幽微,但读起来并不滞涩。除此以外,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地域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小说中的博物馆、护城河、古城门以及古寿州的锣鼓、鼓书、舞龙以及周边地域的文化景观、人文掌故等自然融洽地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背景与历史景观。这些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叙述有效地避开了同类题材的同质化书写,从而让寿州的小城风貌、生活韵味、历史文化内蕴跃然纸上。黄丹丹将亲密关系的审美书写落地于寿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不仅仅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也寄寓了作家内在的生命感受与对故土的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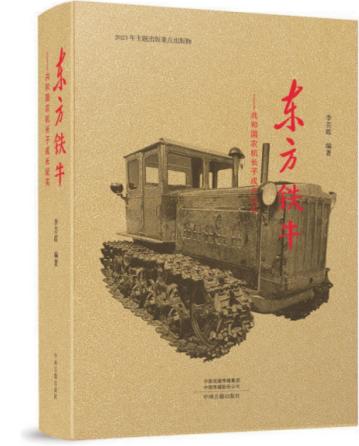
评论家杨庆祥言,未来的文学书写,“亲密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主题面向。这样的判断当然是基于欲望化、碎片化、快餐化、泡沫化以及后疫情时代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裂变作出的。现代或当下的“亲密关系”因为其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或症候,才愈加被文学叙事所关注。作为文学叙事的小说或其他文体不能仅仅成为这种现象的旁观者,如何以文学的微弱光亮那些晦暗的角落,则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书写

——黄丹丹《南有嘉鱼》读札

□陈振华



《东方铁牛——共和国农机长子成长纪实》,李芸霞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

《东方铁牛——共和国农机长子成长纪实》是一部反映中国第一拖拉机厂(以下简称一拖)立项、筹备、建设和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这部6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可以说是一部“共和国农机长子”东方红拖拉机创业的史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一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一个波澜壮阔的工业建设计划,被党中央列入议事日程,国家156个项目落锤定音。156个建设项目,古都洛阳就占了6个,让人更加兴奋的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把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厂厂址定在洛阳。于

诗集《青瓦之上》是《诗刊》社第39届青春诗会推出的丛书之一,诗人王太贵精选了2006年至2024年的诗作共计140首,列为“我有我的深蓝”“当你起航”“时间的炼金术”“寒露之后”“如果看到海”五个小辑。这些诗小部分写于吞风吻雨、登山临水的旅途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写于北京,其时诗人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大部分则写于安徽六安霍邱县,这里是诗人生活的地方。诗集中反复出现的地名“礼堂路”,正位于该县,诗人每天上下班都在这条路上往返。在诗人的书写下,“礼堂路”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诗学地理。它从现实中的“礼堂路”挣脱而出,离地三尺,一端链接着诗人的心灵,另一端则通向复杂而广阔的现实世界。

在第一辑“我有我的深蓝”中有《往返礼堂路》一诗。在该诗句中,诗人写道:“我的往返/从厨房到打印机,正好置于礼堂路的两端”。如果说诗句中的“厨房”隐喻着生活,“打印机”隐喻着工作,那么这一段万物葱茏、百象丰饶的礼堂路,就是诗人展开诗性活动的园地,也是其诗思蕴成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可以把王太贵的写作理解成一种平常的三分法。但实情恐怕并非如此,因为“打印机”,同时还意味着写作本身。假如考虑到王太贵创作的勤奋,这种推测就会显得尤为可靠。如此,“礼堂路”便是一条通往诗的道路,而写诗也具备了工作的属性。应该说,诗歌写作是一种另类的工作,需要严肃而长期的精神投入。这不仅仅因为艺术是对美的创造,还因为艺术可以把隐秘不居的内在意绪客观化、镜像化,使人